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1世纪档案学系列教材

档案鉴辨学

主编 刘耿生 何 庄 张美芳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1 世纪档案学系列教材

档案鉴别学

主编 刘耿生 何 庄 张美芳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档案鉴别学/刘耿生, 何庄, 张美芳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21 世纪档案学系列教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ISBN 978-7-300-09940-8

I. 档…

II. ①刘…②何…③张…

III. 档案鉴定-高等学校-教材

IV. G2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5035 号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1 世纪档案学系列教材

档案鉴别学

主编 刘耿生 何庄 张美芳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密兴印刷厂

规 格 170 mm×228 mm 16 开本

印 张 28

字 数 509 000

邮政编码 100080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言

档案鉴别,即鉴定档案本身真伪,辨别档案内容正误。档案鉴别的主要内容,系针对档案中出现的真赝杂厕、诸多歧异现象,以科学的观点审查其产生的各种原因及造成的恶劣后果,在总结历代先贤鉴别档案文献成果的基础上,考察档案的外形和内容是否存在矛盾,以确定其真伪正误;判定档案准确的形成时间,厘正档案正文中外误文字;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结合传统档案鉴别方法,最终结束伪误档案的信息寿命。

档案鉴别学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是以某些档案出现的“伪误”情况为研究客体,运用整个档案鉴别活动的全部方法,探讨如何能够“慧眼识档”,从而使读者可以准确无误地识别出何者为“伪误档案”,何者为“真正档案”的一门学科。本学科还通过对档案鉴别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概括,向同学们以及档案界同人阐述鉴别工作在档案事业中乃至各项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中所具有的根本性意义。

求得真实可靠的档案,是人类认识自身历史不可超越的第一步,没有这一步,就不会有科学。从事科学研究,就要对客观事物和人物做出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述评,使后人从中得到启示,进而掌握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从

而能更自觉地创造历史。档案的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科学研究成果的质量，只有在真实、丰富的档案文献基础上，才能构筑起雄伟辉煌的科学殿堂。一个严肃的科学工作者，只有以档案为科学研究的基石，忠于档案，忠于史实，才能写出“资治当今，垂范后世”的论著。是谓“秦关汉阙，唐风宋雨，已成往事；笔下波澜，纸上云烟，留传后人”。

人类创造了文字，同时产生了档案，人类进入了文明社会，也正是伪误档案开始出现之时。由于目前对甲骨档案的各方面情况知之甚少，因而研究伪误档案之缘起，以及中国对伪误档案的鉴辨，只能从春秋时代开始。春秋以前，学在官府，私人没有著书立说的条件，也就无法炮制伪书。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是中国文化思想史及档案文献史大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档案文献记载开始混乱的时期，各派都“往造旧说，托古炫众”，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因而伪书开始出现，为了批驳这些伪书，他派学者又以伪攻伪，新的伪书又产生。当时几乎所有学派的开宗大师，无不“口衔尧舜，宪章文武”，挟古人以自重，其间有的真伪之争，至今仍未解决。

先秦的档案鉴辨是从疑古开始的，疑古思想在孔子时代已经产生。先秦诸子不迷信故国档案文献记载，勇于疑古，是为档案鉴辨之滥觞。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诸子们的历史观念仍然没有彻底脱离原始色彩，不可能客观鉴辨先秦档案文献的真伪正误，也未形成档案文献鉴辨的系统方法。先秦的档案文献鉴辨还处于萌芽状态，该阶段可算作中国档案鉴辨的萌芽时期。

秦亡汉兴，历史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秦累代经营，“六王毕，四海一”，而成帝业，陈胜揭竿而起，继之刘邦无寸土之封，起兵讨秦，而后楚汉相争，五年而兴汉。仅仅15年，秦迅速崩溃。秦何以速亡，汉何以暴兴？汉又如何才能长治久安？这是汉初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们都在共同思考的问题。他们试图从秦朝“坑灰”余下的档案文献，以及新征集上来的古本秘籍中寻找答案。汉帝多次降旨，鼓励民间献书，造成邀功请赏者络绎不绝，伪书遂大量问世，迫使史家在治史之前，必须先要辨伪，于是鉴辨工作发达起来，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汉代第一位档案文献鉴辨大家，当推司马迁。

汉代以司马迁为首的学者，开始鉴辨经过焚毁之灾、劫后余生的先秦古籍，并将鉴辨成果运用到《史记》等史著中。而首次将“文”和“献”分开，明确指出“制册诰令，章表移檄”为档案者，乃唐代史学大师刘知几，他写有《疑古》和《惑经》，最早论述了档案文献鉴辨的理论和方法。真正专事档案文献鉴辨，并掀起三次鉴辨高潮的，则是清初以后的事情。

档案文献鉴辨的第一次高潮是清初的考据学，到乾嘉年间，清代学者几乎将

前人档案文献悉数鉴辨完毕，功力不凡，硕果累累，但缺乏理论归纳。第二次高潮是20世纪20—30年代，一大批大师级的史学家和鉴辨大家再次涌现，他们开创了中国近、现代档案文献鉴辨事业，成绩斐然，可是，由于当时档案原件的封闭及战乱的影响，档案鉴辨未能形成系统的学科，尤其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这一事业虎头蛇尾，十分可惜。第三次高潮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我国历史档案的开放，以及史学研究“禁区”相继被打破，学者们从接触的档案原件中发现，不少历史问题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尤其是随着查阅利用档案原件的深入，又发现在历史档案中存在着真伪并存、泥沙俱下、鱼目混珠、混淆视听的现象。许多学者因以伪误档案为据，导致其错误结论纰缪相因，大家感到对上述现象再也不能采取熟视无睹的自然主义态度了，纷纷加入到档案文献鉴辨的行列，在近30年的时间内，“翻了不少大案”，颇有石破天惊之势。

敢于怀疑，则舛误因以订正；志在求真，则成见方能否定。治史和治档历来密不可分，古今中外，多少史家，因以伪误档案为据，在著述中得出错误结论，并被世人接受，以讹传讹，以致误人子弟。诚然，引据或借鉴前人及他人成果，是史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亦是人类知识积累和创造的一种过程。有的历史问题经众多学者反复论证，甚至几代学者的不懈论证，已成为史家公认的“传统结论”，且绝大多数都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是，有的“传统结论”，由于依据伪误档案，因而导致权威论著中某些重要结论面临被否定的命运。驳论只有来自真正的档案，历史研究才能大踏步地前进。

本书将以相当的篇幅对上述问题进行鉴辨或论证，因为以伪误档案为据而得出的错误结论，比没有结论的后果更为可怕。郭沫若先生曾经有一段精辟之至的名言：

无论做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①

只要回顾一下自汉以降，后人用多少精力去鉴辨前人档案，伪误档案又造成了何等的混乱，就会令今人意识到，尽量不从我们手中给后代留下伪误档案，实乃一件嘉惠子孙、功德无量的益举。

^① 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篇·第二卷·十批判书》，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档案文献鉴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证档案文献的可据性和可读性。档案文献的可据性，指其本身和记载内容的真实性、可靠性；档案文献的可读性，指档案文献的内容能够为广大读者所理解，并使人们能够方便地利用。要保证档案文献的可据性和可读性，就必须对其鉴辨，这就首先要分清哪些档案文献是赝品，哪些有不实的记载，哪些是经过了篡改、删削、剔除、涂抹而造成内容失实，以保证其可据性；其次，扫除档案文献中一切妨碍读者阅读的障碍，使读者能够辨识历史档案或私人档案中的繁体草书、鲜为人知的生冷字词、晦涩难懂的暗语俗称，及讹、夺、衍、倒文字现象等，以保证其可读性。

保证档案文献的可据性较之保证其可读性更为重要。若经鉴辨，证实其为伪误档案，说明它已经失去了作为科学研究的依据资格，保存和利用的价值亦大大减少；而内容艰深难懂的档案文献，如甲骨文档案，或字迹极为潦草的日记、信函、账簿，以及勾改杂乱的手稿、札记，或不分段、无标点的历史档案等，虽然真是真品，但现今读者很难阅读或辨认，也就不可能去利用它，其可据性自然也要受到影响，当然，读者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例如查阅有关工具书，向学者请教等）来辨认可读性差的档案。总之，为了保证档案文献的可据性及可读性，必须进行鉴辨，其最终目的是方便读者阅读和利用档案。

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副主任赵国俊教授对我说：“吴老（宝康）有个建议，我国开放历史档案后，学者们发现有的档案内容不真实，也有的档案根本就是假的，影响很坏。档案系是否应开设一门‘档案鉴辨学’，鉴定档案本身真伪，辨别档案内容正误。由于你讲的‘档案文献编纂学’其中有一章是‘档案文献考订’，能否根据吴老的建议在此基础上吸收利用现代科技手段鉴辨档案的方法，开设一门新课？”

根据吴老和系领导的建议，我首先给档案系本科生开设了“档案文献鉴辨学”。1990年以来，又在总结中国历朝伪误档案鉴辨方法与理论的基础上，给研究生开设了“档案鉴辨与历史研究”课程。结合教学实践，我在查阅有关档案文献时，发现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每一件大事，都产生过伪误档案，这也促使我对一些伪误档案进行鉴辨，先后在海内外公开发表了很多有关档案鉴辨的文章。

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档案鉴辨的第三次高潮中，对档案真伪的研究，思想解放，范围广阔（明清档案、民国档案、中共档案、外国档案均在鉴辨之列），并日趋科学、缜密、成熟，填补了中国档案学上的一项学术空白，本书即是在上述教学与科研基础上披沥而成。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档案鉴辨的第三次高潮仍呈波澜之势，因此我们在本教材中还开创性地加入了利用物理、化学等方法结合传统方法对档案的鉴辨，以及照片

档案、音像档案、电子档案的鉴别技术与方法，希望能够培养出具有“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观念的档案鉴别领域的一代新人。

在我国，档案鉴别是一项古老的学术活动，但档案鉴别学却是一门十分年轻的学科，我们几位老师是在不断学习、不断实践和不断探索中来完善这门课程的。为了使广大同学及档案工作者能够更顺利地理解和掌握此课程，我们在编写本教材的过程中，较多地引用了一些著名学者档案文献鉴别的实例及理论总结，并增加了档案鉴别实验课内容，以供借鉴。

本教材第一、第七章由刘耿生执笔，第二、第三、第四、第八章由何庄执笔，第十三、第十四由张美芳执笔，第九、第十章由刘耿生、张美芳共同执笔，第十一章由何庄、张美芳共同执笔，第五章由潘月杰执笔，第六章由朱兰兰执笔，第十二章由张芳霖执笔，第十五章由李文以执笔，全书由刘耿生、何庄、张美芳总规划并统稿，黄静、李佳佳、钟国文、张江珊、李永贞、贺国庆协助主编做了大量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潘宇、骆骥二位编辑为本书的顺利出版和质量保证，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令人钦佩，在此致以由衷的感谢。

为了尽可能全面、广泛地向本书读者介绍档案鉴别知识，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引用、参考了国内外一些和本学科相关的文献资料，除以脚注方式加以说明外，还在书后列有“参考文献”书目，在此一并向这些文献的作者致以深深的敬意。

因为我们水平有限，书中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本书在完稿时惊悉吴老已经作古，仅以本书作为对吴老的纪念。

刘耿生
2008年5月

21

世纪
档案学
系列教材

目 录

绪 论 伪误档案概述	1
第一节 伪误档案现象	2
第二节 伪误档案危害	19

第一编 历史篇

第一章 先秦至魏晋时期的档案文献鉴辨	35
第一节 先秦学术文化与档案文献鉴辨的萌芽	36
第二节 两汉学术文化与档案文献鉴辨的形成	40
第三节 魏晋六朝的学术思潮与档案文献鉴辨	54
第二章 隋唐至宋明时期的档案文献鉴辨	57
第一节 隋唐时期档案文献鉴辨的发展	58
第二节 宋代档案文献鉴辨的发达	66
第三节 明代档案文献鉴辨的独立	79

第三章	档案文献鉴辨的第一次高潮——清代	84
第一节	清代前期的档案文献鉴辨成果	85
第二节	乾嘉考据学派的档案文献鉴辨成果	90
第四章	档案文献鉴辨的第二次高潮——清末民初	100
第一节	“新考据学派”及其兴起的历史条件	101
第二节	维新派的档案文献鉴辨成果	103
第三节	章太炎、罗振玉与王国维的档案文献鉴辨成果	108
第四节	胡适和“古史辨派”的档案文献鉴辨成果	116
第五节	陈垣、陈寅恪与钱穆的档案文献鉴辨成果	121
第五章	档案文献鉴辨的第三次高潮——20 世纪 80 年代	131
第一节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档案文献鉴辨概述	132
第二节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档案文献鉴辨的理论进展	142

第二编 方法篇

第六章	档案鉴辨原理及原则	155
第一节	档案鉴辨原理	156
第二节	伪造档案和变造档案	162
第三节	孤证不立	168
第四节	谦退却疑	173
第五节	端正考风	177
第七章	档案外形鉴辨（一）	181
第一节	档案字迹鉴辨的方法	182
第二节	墨水和圆珠笔字迹的鉴辨	195
第三节	印刷油墨和印油、印泥的鉴辨	197
第四节	静电复印件的鉴辨	204
第五节	被遮盖文字的显现技术	209
第六节	黏合剂的鉴辨	213
第八章	档案外形鉴辨（二）	217
第一节	档案纸张概要	218
第二节	档案纸张的演变	225
第三节	档案纸张的鉴辨原则及方法	227

第九章	档案内容鉴辨	242
第一节	档案作者鉴辨	243
第二节	档案史实鉴辨	247
第三节	常理或典章制度鉴辨	252
第四节	档案用语鉴辨	255
第五节	档案来源鉴辨	273
第六节	档案署衔鉴辨	276
第七节	档案外形鉴辨与内容鉴辨相结合	281
第十章	档案文献的印章鉴辨	285
第一节	历代印章发展概述	286
第二节	印章的种类及鉴辨的复杂性	295
第三节	印章的鉴辨方法	299
第十一章	档案形成时间鉴辨	311
第一节	内证法	312
第二节	外证法	323
第三节	内外证结合法	328
第十二章	档案文献的文字鉴辨	336
第一节	文字鉴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337
第二节	文字讹误的现象	338
第三节	文字讹误的成因	345
第四节	文字鉴辨的方法、条件和要求	349

第三编 专题篇

第十三章	照片、音像档案真伪的鉴辨	365
第一节	照片档案的鉴辨	366
第二节	音像档案的鉴辨	369
第十四章	电子文件的真伪鉴辨	378
第一节	影响电子文件真实性的风险	379
第二节	电子文件真伪鉴辨的特殊性	386
第三节	电子文件真实性的鉴辨方法	389

第十五章 档案鉴辨实验.....	410
实验一 显微镜法检验纸张纤维形态.....	410
实验二 正常字迹的检验.....	412
实验三 用薄层层析法分析墨水的成分、鉴别墨水的产地.....	414
实验四 印刷版型和打印、复印文件的种类鉴别.....	416
实验五 纸张上压痕字迹的显现方法.....	417
实验六 被消退字迹的检验及显现方法.....	419
实验七 相对书写时间的检验.....	421
参考文献.....	423



绪论

伪误档案概述

【本章要点】

- 伪误档案产生的历史客观原因
- 伪误档案产生的人为主观原因
- 造成难以阅读和利用的档案之自然原因
- 档案的可读性与可据性
- 伪误档案在诸多领域导致的危害

【关键词】

伪误档案○档案鉴别○档案失真○档案失实○档案失时○档案失辨○伪造档案○假托档案○篡改档案○档案文字讹、夺、衍、倒

人是文化的载体，档案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由于档案是历史的原始记录，从理论上讲，它的真实程度要高于其他类型的文献，每当不同类型的文献对某一人物或事物记载相异时，人们总是以档案原件作为依据，这便是档案得天独厚的凭证价值。但是，人类自身的弱点也往往对档案造成不良影响，致使许多档案出现“失真”（伪造、篡改、假托），“失实”（内容记载错误），

“失时”（无形成时间或形成时间不准确、不完整）和“失辨”（文字上的讹舛）等状况，存在上述情况的档案统称为“伪误档案”。

第一节 伪误档案现象

一、历史客观原因

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任何时代的任何人，皆不可能超越自己所处的历史环境，一个人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无论是滞后还是超前，都将造成他最终的悲剧，因为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人们有限的认识。在科学不发达的时代，由于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理解能力比较落后，因此很难正确、全面、深刻地对见到的人物或事物得出客观的结论，以致在制作档案时，可能形成误记，使真实的档案出现不真实的内容。这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只是囿于历史条件的制约而产生的错误，称为历史客观原因。它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影响

人类自从步入文明社会，就开始受到政治的影响，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政治限定的范围内去思考问题，每个人的社会观点、学术见解、个人情感，都被打上了不可摆脱的政治烙印，但政治影响不可能全是正确的，恰恰相反，政治的负面影响往往是比较严重的。档案形成者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必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他在形成档案文献的过程中，由于受政治影响，会身不由己地错记、误记一些史实，但这是历史造成的，后人应用历史的观点对待，而不能苛求前人。

例如，陈寿（公元233—297年）的《三国志》是“二十四史”中史料价值较高的一部。陈寿生活在魏末晋初，由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慑于曹魏权势的压力，不可能秉笔直言，因此他在《魏武帝纪》中写曹操为：“天子以公领冀州牧”；“汉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为丞相；天子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公为魏公”；“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给读者的印象是，曹操的官职爵位都是汉帝封赐的。陈寿之后的范曄生于南朝，已不受魏晋政治影响，因此在《后汉书·献帝纪》中写道：“曹操自领冀州牧”，“曹操自为丞相”，“曹操自立为魏公”，“魏王丕称天子”，说曹操的官职都是自封的。陈寿因有难言之隐，被迫曲笔，但他的传世名著《三国志》信誉卓著，仍是信史，读者只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论证，是不难得出正确结论的。

（二）神化色彩

由于古人的认识水平有限，对于许多历史现象，往往离开了媚神便无法思维，

致使档案出现神化色彩。这是历史因素造成的，尽管这会造成档案内容不实，但是从这些神化、甚至带有迷信色彩的记述中，亦可以了解到古人的真实思想。

例如，满族档案中记载了一个美丽的神话：远古时代，有七位仙女到布勒湖（长白山天池）“浴躬”，其中一个仙女吞食一枚“朱果”，遂产子，即“满族始祖”。这个神话反映了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满族对萨满教泛神论的崇拜，可以看出古代民俗文化及民族进化的历史。在许多少数民族历史档案中皆有神化色彩内容的档案，对其认真收集、整理和研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应注意的是，许多美丽的神话传说后来为统治者所利用，经他们添枝加叶，成为维护其统治、欺骗、愚弄人民的宣传工具，这要和上述纯洁的神话严格区分开来。自努尔哈赤以后，清代官方档案将“仙女之子”从“满族始祖”改为“爱新觉罗的祖先”，在《满洲祭天祭神典礼》中写道：“满洲肇基始祖，原系天降神女所生，所以今有祭长白山神之礼。”这就和少数民族档案中美好的神话传说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而成为典型的欺人之谈。

（三）以今系古

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往往很难产生或保存档案，如在激烈的战争或艰苦的环境中，尤其在像“文化大革命”这样极为动荡的时代，更是如此。事后为了补充记录这一段历史，除了尽力搜寻凤毛麟角般残存的档案外，普遍的补救措施是请当事人撰写回忆录，或通过调查访问由专门人员代写“访问记”之类的作品。回忆录内容多为作者亲身经历，再参考有关史料追记而成，因此回忆录中提供的许多细节，可以弥补某些档案中记载之不足；又因撰述者或亲自参加了某一历史事件，或和某一人物有过来往，故记述的情节令人读起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有身临其境之感，因此不少档案部门将回忆录手稿视作档案，将出版的回忆录视同档案文献，认为今日形成之回忆录，即为明日典藏之档案，是有一定道理的。

回忆录是当事者将自己或与自己有关的历史，以大脑为载体，形成记忆，再转载成文字等材料的一种文献形式。回忆录中的信息，原是“记录”在当事者大脑中的“无形的档案”，当事者将自己的回忆从大脑转移到其他形式的载体上（如纸张、音像制品等），实质上是档案内容的转录。但因为记忆的偏差，尤其是由于年代久远，回忆往往有误，不少回忆会出现以今系古的现象，即将事发以后的观念安到事发当时，而这些观念是当时人们不可能具有的。

例如有一部回忆录《任弼时》^①，在回忆1927年的情况时，有这样的记述：1927年9月26日，秋收起义后，任弼时参加完中共“五大”，回到长沙，先见

^① 参见中共湖南省汨罗县委宣传部编：《任弼时》，71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

到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夏曦，任弼时问：“毛泽东同志现在在哪里？”夏曦答：“已经率领部队离开浏阳，详情还不太清楚……中央的意见，是要毛泽东同志率部队继续攻长沙。”由此可见，任弼时并不知道毛泽东此时在哪里。当天任弼时又到板仓去看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任弼时问杨：“毛泽东同志最近是否有信来？”杨开慧说：“没有音信。”任弼时又问：“你是否想到井冈山那边去？”仅凭这一句，就知其伪。因为任弼时一再打听毛泽东现在何处，证明他不知道毛泽东在哪里，既然如此，怎么能问杨开慧是否要去井冈山找毛泽东呢？这是回忆录作者将自己后来知道的情况，加到了当时任弼时的身上，何况，毛泽东在1927年9月底，即任弼时看望杨开慧时，还没有上井冈山，毛泽东决定上井冈山是以后的事情，任弼时在当时是绝对不可能问出这句话的，可见此段回忆和当时几个人物的实况不符，属于典型的“以今系古”。

（四）以讹传讹

有的档案文献作者道听途说，不加分辨，信以为真，以讹传讹，造成档案文献内容不实，给学术界造成不少麻烦。以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为例，从总体上讲，这部回忆录所记史实比较真实，史料价值较高，但是也有一些作者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事情。

溥仪生于1906年，1908年当皇帝时才3岁，1911年下台时6岁，1924年离开皇宫时也才18岁。宫中许多往事他是听别人讲的，未加分辨，即搬进回忆录。例如，他在该书第一章“四、摄政王监国”中写康熙杀鳌拜的经过为：

有位在内务府干过差使的“遗少”给我说过，当时摄政王（载沣，溥仪之父）为了杀袁世凯，曾想照学一下康熙皇帝杀大臣鳌拜的办法。康熙的办法是把鳌拜召来，赐给他一个座位，那座位是一个只有三条好腿的椅子，鳌拜坐在上面不提防给闪了一下，因此构成了“君前失礼”的死罪。^①

溥仪听来的这段回忆就不符合历史事实。康熙铲除鳌拜的方法是：鉴于鳌拜在康熙侍卫中影响较大，普通侍卫不足依靠，康熙特选踏实可靠之侍卫及拜唐阿（执事人）中年少有力者，以“捕击之戏”为名，组成善捕营。然后康熙用各种名义将鳌拜党羽派出京师，以削其势。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十六日，他向善捕营宣布了鳌拜三十大罪，召鳌拜入宫，“立命擒之”，并没有让其坐三条腿的椅子。再说，鳌拜若真的因跌倒而“君前失礼”，也构不成死罪。何况，康熙也没有杀鳌拜，仅仅将鳌拜“革职籍没，仍行拘禁”，后来鳌拜死于狱中。

^① 溥仪：《我的前半生》，23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64。

类似这种档案记载内容以讹传讹的事例很多，以讹传讹是造成档案内容不实的主要原因之一。

（五）传抄致误

档案在形成、传抄、刻印过程中，由于经手人的文字水平较低，书写环境急迫，书写工具粗劣以及粗疏草率等原因，很容易在文字上出现错讹、疏漏、重出和颠倒等现象。错一个字，就会使文意含混费解，不可卒读，甚至与正确的原意大相径庭，这是档案中经常见到的现象。档案文字上的种种谬误，绝不仅仅是个单纯的文字问题，它势必会影响到后人对档案内容的理解，使之发生扭曲，产生歧解，甚至疑窦丛生，令人无法读释。有的文字千年来争论不休，因此鉴辨出正确的原字，意义是巨大的。

有一件档案《孔庆镕两次赴京为嘉庆祝寿纪实》，内容为嘉庆皇帝接见孔子第七十三世孙孔庆镕的谈话记录，其中嘉庆皇帝说：“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总不能去（曲阜），是个大缺点。”^①清代何能有“缺点”一词？经鉴辨，应为“缺典”，即于典礼有缺之意。

又如，在《曾国藩未刊信稿》中，由于根据曾氏手迹抄写，因而有几处将“侍郎”写作“侍御”，“俟接台函”写作“嗣接台函”，“难虏多船”写作“难雇多船”，“百余金”写作“万余金”。“侍郎”与“侍御”官名不同，品秩职掌亦大有差异；“俟”与“嗣”用法相反，一个用于事情尚未发生之时，一个用于事情已经过去之后；“虏船”与“雇船”则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行为；而“百余金”与“万余金”差别更大。

诸如此类文字上的错误，不仅会给读者造成阅读和理解上的困难，同时还直接影响了档案内容的真实性。读者利用档案，是要通过原文体察原意，而原文文字有误，势必妨碍对原意的理解，若以此作为历史研究的依据，自然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还有的档案，其文字远不如当代图书那样明晰易读，除了文字上存在讹误等现象外，还存在文字上不一定有错讹，但读者仍会误解其意的可能，其负面效果是一样的。往往因一个字无法辨认而影响对全文的理解；也有的字被争论了许多年，至今没有定论。

二、人为主观原因

由于档案的形成者是人，除了记载有关自然现象（如气象、天文、地震、水

^① 山东省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所藏“孔子历代衍圣公奏折档案”，转引自《历史档案》，1987（1）。